

《南華日報》副刊與日治時期香港文學

(研討會討論稿，請勿引用)

陳智德

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

摘要

《南華日報》一九三〇年創辦，由汪精衛陣營主持，三十年代末在香港展開反對抗日的「和平運動」宣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被日軍佔領後，成為少數維持出版的報紙。《南華日報》副刊「一週文藝」與「前鋒」於日治時期一方面鼓吹「和平文藝」理論與創作，另一方面也提供園地供留港作家發表不觸犯禁忌的文學創作，本論文以《南華日報》副刊為中心，探討日治時期香港文學幾種不同的面向。

關鍵詞

日治時期 和平文藝 南華日報

《南華日報》副刊與日治時期香港文學

陳智德

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

—

香港新文學從一開始即與報紙副刊的發展相連，二十年代中後期，多家報紙陸續增設新文學副刊，如《大光報·大光文藝》、《循環日報·燈塔》等，推動早期新文學的發展。抗日戰爭爆發後，不少內地報刊由於戰事南遷香港出版，如《申報》、《立報》、《大公報》在一九三八年先後從上海南遷香港復刊，此外，《星島日報》也在一九三八年創刊，這些報紙以及香港既有的《華僑日報》、《工商日報》，都很重視副刊，且由於抗日戰爭緣故，香港報紙的副刊許多都成為抗日文學的園地。

當時的香港政府雖然對報刊實施嚴格審查，不可印出「敵」、「日寇」等字眼，在抗戰初期，相對內地已淪陷的地區，香港仍是抗戰宣傳的重要據點，且成為了戰時報刊的中轉站：戰時南洋和港澳的出版物，主要是透過香港經桂林轉往內地的，據記載，香港的《大公報》、《星島日報》、《大光報》、《循環日報》、《工商日報》、《申報》、《星報》、《大眾報》、《珠江日報》、《立報》等多種報刊，七天內便運抵桂林，而大後方的報刊，也由桂林轉往香港，再轉運上海等淪陷區。¹另據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中國抗戰文藝史》所述，「在沉寂的一年中（一九四一）最活躍的地區是作為文藝據點之一的香港，因大批文藝作者的集中和一些書店資金的外移，香港的文藝活動在入夏以後，顯得蓬勃而活躍起來」²，指出了香港在抗戰文學的重要「據點」地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發動太平洋戰役，向英、美、法諸國宣戰，也於同日轟炸香港及南洋等地。日軍先轟炸九龍啓德機場，同時從陸路入侵新界，五天內便控制了九龍半島。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英軍投降，日軍正式佔領了香港，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

「日治時期」是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香港被日軍佔領，佔領初期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至四二年二月底，由「軍政廳」執行主要的統治工作，屬於軍治時期；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日軍正式宣佈香港為日本佔領地，稍後在香港舊匯豐銀行大廈設立「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由磯谷廉介出任香港佔領地總督，便進入「民政府」時期，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¹ 參蔡定國、楊益群、李建平《桂林抗戰文藝史》（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4）頁14。

² 參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上海：現代出版社，1947）頁48。

日本宣佈投降為止。³

這段時期大部份作家逃離香港，原有報刊停辦，不過一九四二年至四五年間的香港文學並不如一般想像的完全沉寂，而是具有至少兩種取向的作品，第一是親日的「和平文藝」理論及創作。所謂「和平文藝」或稱「和平文學」或「和平建國文藝」，主要是為配合南京汪精衛政權的親日主張「和平運動」而製造輿論。其淵源須上溯至一九三八年林柏生受汪精衛指派在香港成立「國際問題研究所」及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香港《南華日報》發表汪精衛表明親日立場的「豔電」。香港「和平文藝」陣營的主要作者包括娜馬、陳檳兵、李志文、李漢人、蕭明等人，理論文章有娜馬〈和平文藝工作者的再教育〉、李漢人〈和平文藝之新啓蒙意義〉等文，明確提出與日本合作、「建設東亞新秩序」、「和平反共」、反對抗戰等主張。

一九四二年至四五年間香港文學的第二種取向，是戴望舒、葉靈鳳、黃魯、陳君葆、靈簫生、小生阿高（高雄、三蘇）等作家在「和平文藝」主要陣營以外的可能範圍中，以曲筆或避免觸及禁忌或通俗文學的方式，繼續發表作品。

以上兩種取向是大略的分類，但日治時期香港文學的複雜性在於還有界乎兩者之間的第三種取向。參與「和平文藝」陣營的作者或難免被歸入「漢奸文學」的類別，但觀乎其個別作品實未能一概以其為敵偽宣傳而否定，即使曾寫過「和平文藝」理論的作者，也不無可讀之作。

香港史學者對這時期的政治、軍事和社會情況有相當規模的研究，但有關文學的研究則很少；另一方面，中國內地學者在中國淪陷區文學的研究上，對華北、華中及華南的情況都分別作出研究，唯獨對香港的情況描述不多。日治時期的香港文學史料長期湮沒，然而當中不同取向作品所呈現的矛盾，值得我們拋開種種既定思維（例如認定香港沒有文學、日治時期的香港文化一無可取等等），重新予以關注。

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日軍攻佔香港後，大部份報紙停刊。一九四二年初，部份報紙恢復出版，但至六月一日，日軍強迫報社合併，《大眾日報》併入《華僑日報》，《華字日報》併入《香島日報》，《自由日報》、《天演日報》與《新晚報》則與《南華日報》合併，日治時期，香港只餘下《華僑日報》、《香島日報》、《南華日報》和《東亞晚報》四份中文報刊。⁴

《南華日報》、《天演日報》、《自由日報》和《新晚報》在香港淪陷前已配合汪精衛政權的「和平運動」，以「和平文藝」抗衡抗日文藝陣營。以上四報俱由

³有關香港日治時期的歷史，可參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93）；高添強、唐卓敏編著《香港日佔時期：1941年12月-1945年8月》（香港：三聯書店，1995）及劉智鵬、周家建《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中華書局，2009）。

⁴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93）頁140。

於推行「和平運動」的宣傳，在三九至四一年間獲南京汪系政權「中央黨部宣傳部」按月發給補助。⁵進入日治時期後，《南華日報》仍鼓吹「和平文藝」理論和創作。

《南華日報》由汪精衛的親信林柏生在香港創辦，該報前身是一九二九年創辦的小報《胡椒》（初名為《參緣》），據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南華日報概況》的介紹，《胡椒》的任務是「揭發軍閥官僚的黑幕」⁶，實際上是配合汪精衛陣營針對蔣介石、進行國民黨內部鬥爭的「護黨救國運動」，利用香港殖民地相對自由的言論空間作政治宣傳，正如李家園所論，「捧汪（精衛）正是林柏生辦《胡椒》的真正目的」⁷。

《胡椒》以小報形式出刊，格局和發揮作用有限，一九三〇年，林柏生以大報的規模再辦《南華日報》，由於國民黨政治形勢改變，包括汪蔣合作等，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南華日報》的政治色彩常為其著力經營的本地新聞內容、文藝副刊和體育新聞所掩蓋，⁸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間陳克文任報社社長、侶倫主編文藝副刊「勁草」期間，更被視為刊登「現代派」詩歌的園地，⁹後來報社改組，侶倫離開了南華日報社，「勁草」作者群更換，現代派詩歌的印象不再。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汪精衛持「主和派」的態度，脫離重慶國民政府，推行「和平運動」，為配合該運動，《南華日報》透過副刊推行「和平文藝」理論與創作，開始把政治意識與文藝路線結合。一九三八年，林柏生受汪精衛指派在港成立「國際問題研究所」，實際上是執行國民黨反共宣傳工作的「藝文研究會」的香港分會，周邊機關包括「蔚藍書店」、「國際編譯社」和「日本問題研究會」，出版刊物有《國際週報》（樊仲雲主編）和《國際通訊》（朱樸主編）等，工作人員有胡蘭成、連士升、杜衡和林一新等人。¹⁰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香港《南華日報》發表著名的汪精衛表明親日立場的「豔電」，該報副刊亦開始刊載更多有關「和平運動」的宣傳。據《宣傳部第一屆全國宣傳會議報告彙編》所載「南華日報社」報告及伍培之〈香港宣傳工作概況〉所述，《南華日報》的副刊是為「和平運動」的宣傳而設計，在主要的文藝副刊「一週文藝」（後改為半週文藝）主張「和平文藝」，並與抗戰文藝陣

⁵ 參《宣傳部第一屆全國宣傳會議報告彙編》第一輯「宣傳部報告」，南京：宣傳部，1941年6月。見秦孝儀等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6編傀儡組織（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650-652。

⁶ 《南華日報概況》（香港：南華日報社，1941年8月4日），頁5。

⁷ 李家園《香港報業雜談》（香港：三聯書店，1991），頁106。

⁸ Lawrence M.W.Chiu: *The South China Daily News and Wang Jingwei's Peace Movement, 1939-41.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50, 2010 p.344.

⁹ 參 O.K 〈香港詩歌工作者初次座談會剪影〉，1938年7月20日《大眾日報·文化堡壘》，另見陳智德編《三四〇年代香港新詩論集》（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2004）頁126-128。

¹⁰ 參朱樸〈記蔚藍書店〉、羅君強〈一個暗中散布反共降日毒素的灰色文化團體——藝文研究會〉，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206-207及頁201-202。此外，據路易士（即紀弦）的回憶，一九四〇年他從上海再次來到香港，也經杜衡介紹進「國際通訊社」工作，他在香港、上海和南京先後與杜衡、林一新、楊之華及胡蘭成交遊，但強調自己並未實際參與「汪派」陣營，其與楊之華合作創辦《文藝世紀》只屬文藝工作，不涉政治。參紀弦《紀弦回憶錄》第一部（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頁117-122；152-154。

營（伍培之文中稱「妄戰文藝」）展開論戰，另一文藝副刊「前鋒」則「以專載一般愛好和平之青年作品為中心」¹¹。

「豔電」發表後，汪精衛年再於廣州發表〈怎樣實現和平〉，被視為「從事和平運動實際工作之開始」¹²，稍後汪氏政權提出「和平、反共、建國」政治綱領，¹³和平運動主要延續日本近衛內閣提出「建設東亞新秩序」和汪精衛「豔電」的親日主張，提出停止抗日，與日本共存共榮。¹⁴所謂「和平文藝」或稱「和平文學」或「和平建國文藝」，主要是為配合「和平運動」的宣傳製造輿論，而香港在「和平文藝」陣營中的位置，早在一九四二年已由上海《中華日報》的編輯楊之華提出：

為更生中國的「豔電」發表以後，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又有了另一個新的出發，緊隨著我們最高領袖汪先生的指示，「和平運動」於一九三九年末一九四〇年初，先後發動於香港和上海兩地，而作為配合於這一運動的「和平文學」也就為了時代的需要而產生。關於和平文學理論的出發點始自香港的「南華日報」，而這一理論的建立，則為上海的「中華日報」。¹⁵

香港《南華日報》實與上海《中華日報》並為四〇至四二年間「和平運動」宣傳的中心，根據楊之華的說法，「和平文藝」的理論更首先發軔於香港。楊之華提到參與上海「和平文藝」的作者包括穆時英、劉吶鷗、張資平、丁丁、陳大悲等等，但沒有再說及香港的情況。¹⁶翻查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二年間的《南華日報》，可知香港「和平文藝」陣營的主要作者包括娜馬、陳檳兵、李志文、李漢人、蕭明等人，理論文章有娜馬〈論和平文藝的創作方法〉、〈和平文藝工作者的再教育〉、李漢人〈和平文藝之新啓蒙意義〉、〈理性的吶喊——和平文藝作家大團結〉、瑩冷〈論和平文藝的兩個問題〉等文，明確提出與日本合作、「建設東亞新秩序」、「和平反共」、反對抗戰等主張，這在當時已引來抗戰文藝陣營很大的

¹¹ 參「南華日報社」報告及伍培之〈香港宣傳工作概況〉，刊於《宣傳部第一屆全國宣傳會議報告彙編》，南京：1941年6月。見秦孝儀等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6編 傀儡組織（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939-940。伍培之任宣傳部「簡任特派員」，曾負責香港《南華日報》的副刊工作。

¹² 汪精衛〈怎樣實現和平〉一文的編者按語，見宣傳部編《和平反共建國文獻》（南京：宣傳部，1941）頁21。

¹³ 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傳部編《和平反共建國文獻》（南京：宣傳部，1941）頁27-35。

¹⁴ 見汪精衛〈和平宣言〉，宣傳部編《和平反共建國文獻》（南京：宣傳部，1941）頁97-99。

¹⁵ 楊之華〈新文藝思潮的起源及其流變〉，原刊《東方文化》創刊號，一九四一年，這裡轉引自劉心皇《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楊之華（1913-?）另有筆名楊樺、楊一鳴，廣東省人，少年時曾在香港讀書，上海淪陷後擔任《中華日報》副刊主編，一九四四年曾赴東京參加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編著有《文藝論叢》和《文壇史料》等。

¹⁶ 事實上「和平文藝」在香港的活動情況也長期湮沒無聞，直至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的《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1927-1941年）》出版，相關文獻才重新公開，三位編者在前言〈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三人談〉中也論及香港「和平文藝」的情況，《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1927-1941年）》一書可說是第一本有系統地整理香港「和平文藝」的著作。

反響，香港《星島日報》、《立報》、《大公報》、《文藝青年》等刊物都刊登過不少文章指摘和平文藝的親日主張，《星島日報》且組織過「肅清賣國文藝特輯」，撰文者包括有戴望舒、施蛰存、徐遲、馬蔭隱、葉靈鳳等作者，以強硬措詞指出和平文藝的謬誤，以致內文被港府新聞檢查機關大幅抽檢刪除。

對於抗戰文學的指摘，「和平文藝」陣營亦有自己的反擊，如娜馬〈關於「寫生競賽」的批判——給大公報文藝版編者的公開信〉一文反駁葉靈鳳、施蛰存等作者的批評。除了「和平文藝」理論，娜馬、陳檳兵、李志文等作者也發表詩歌和散文，在香港淪陷之後依然活躍於《南華日報》副刊。

有關和平文藝的具體內容，在初期即一九四〇年未有統一說法，不同論者各自表述，各有不同重點，如娜馬〈論文藝的創作方法——建立和平建國的現實主義〉強調「和平文藝的現實主義」，瑩冷〈關於通俗化〉強調通俗化和大眾化，李漢人〈和平文藝之新啓蒙意義〉提出「和平文藝否定了五四文化運動的個人主義，同時也否定了五四以來的國防文學和民族文藝。¹⁷」塞綺明〈和平文藝的反戰文學〉則澄清和平文藝「決不是純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來反對屠殺」，作者指「仇恨地，咀罵抗戰論者的反戰文學」與「盡量歌頌皇軍的文明的過火的稱讚的反戰文學」同樣是錯誤的方向，因而提出「今日之反戰文學是基於理性主義的立場來宣傳反戰……針對著抗戰論的陰謀，而同時基於東亞千年大計為出發點，那末，這才是能夠發揮積極作用的反戰文學。¹⁸」以上可見和平文藝陣營的論點從現實主義、通俗化、啓蒙到反戰等等各有不同重點，當然在文學討論的表面以外，最重要還是反對抗戰文學的主張，至一九四一年的施紛〈和平文藝現階段的政治綱領〉一文，提出和平文藝服務於政治的真正目的，可視為回到政治主題：

和平文藝，我們不必否認，而更該驕傲地大聲疾呼地去承認，是服務於偉大的和平建國反共的革命運動的；因之，我們和平文藝的一切創作傾向與創作方法，也該是毫無條件的受著和平反共建國底偉大的革命運動之嚴厲的政治制約的，換一句話說，和平文藝就是一種和平、反共、建國的文藝。

19

文中提出因應政治形勢改變，即當時「國府還都」和「中日條約」的訂立，和平文藝原先反對戰爭（主要是針對抗戰文藝）的策略須予調整為「反映條約之實行中之一切之現實」，和平文藝理論重點亦開始轉變。

三

日軍侵佔香港後，經過一段由「軍政廳」統治的時期，至四二年設立「香港佔領地總督部」代替軍政廳，同時出於「以華制華」的政策，組織有名望的華人

¹⁷ 《南華日報·一週文藝》，1940年7月13日。

¹⁸ 《南華日報·半週文藝》，1940年11月7日。

¹⁹ 《南華日報·半週文藝》，1941年4月21日。

成立「華民代表會」及「華民各界協議會」(簡稱「兩華會」)，新聞媒體方面，親日的《香港日報》、《南華日報》、《天演日報》和《自由日報》在四一年十二月底就已復刊，稍後《華僑日報》和由《星島日報》改組而成的《香島日報》亦陸續出版，日佔時期的香港文學作品主要發表在《南華日報》、《香島日報》、《香港日報》和《華僑日報》的副刊和《新東亞》、《大同畫報》等刊物上。

日佔時期《南華日報》的文藝副刊有〈星期文藝〉、〈前鋒〉、〈副刊〉等，主要作者有戰前已活躍、兼寫評論和新詩的娜馬、陳檳兵、李志文等人。在四二年二、三月間，《南華日報》副刊仍有〈和平文藝論〉、〈香港文壇的清潔運動〉等宣傳性的評論，及後「和平文藝」的宣傳大幅退減，轉以文藝性為主。

在這特殊時期，作家自然難以暢所欲言地寫作，一些歌功頌德和替日軍宣傳的作品如〈勇士頌〉、〈東亞新秩序〉等新詩，當然無甚足觀，不過即使是寫過「和平文藝」論、有「附敵」嫌疑的作者，也不無可讀之作，如李志文的〈鄉音〉：

聞說故鄉在戰鬥中
是慣常之戰鬥

雖然近來很少夢到珠江
珠江正洪流浩蕩

當他奔馳於山川叢林
當他扶著母親守望
年青的人記著我²⁰

本詩寫對故鄉的懷念，也寫對戰情的看法，後者尤其值得注意。當作者提到故鄉的战情，在第二句形容為「是慣常之戰鬥」，強調那是慣常、是一般、常見，好像沒什麼特別，在這平淡的語氣中，當中的感情亦似乎是平淡的，不過再讀第二節，當作者談到很少夢及的珠江，卻形容為「洪流浩蕩」，在這不平靜的描寫當中，看到了作者的激情。另一方面，「很少夢到」指向於忘記，結句卻以「記著」作結，在遺忘與記憶中，作者最後強調的是記憶。

綜觀全詩是矛盾的並置，既平淡又激盪，既遺忘又記著，但在詩句的前後安排中，又不難領會前者只是一種語氣上的掩飾，本詩真正指向的還是珠江的「洪流浩蕩」和對「記著」的執著。

另一首值得一讀的詩是羅玄圃〈生命沒有花開〉：

我的家是一片落葉，
惟有單調與悠閑的綠色。

生活永遠地如此輕盈麼？

²⁰ 《南華日報·副刊》，1944年7月14日。

有如雲雀飛過野澗，
掉下了的一根羽毛，
沒有聲浪沒有縱跡。

憤懣蠶食著無聊的日子
把自己當做蝸牛罷；
生命蟄伏在硬殼裡，
沒有聲浪沒有縱跡。

黑夜裡生命不會開花，
我需要光和熱，
忍耐麼——沉默，
我期待黎明！²¹

這詩寫平靜和悠閑的生活當中，潛伏著壓抑的憤懣，調子低沉、落寞，卻又不純然如此，在第四節表達了對現況的不滿，敘述者處於「不會開花」的黑夜，而期待有「光和熱」帶來改變，強調忍耐和期待，詩句隱藏著呼喊、真正內在的憤懣，但最終的沉默歸於壓抑。正由於當中的壓抑，更突顯作者對沉默的內在抵抗，內裡有巨大的反抗和憤怒，在無聲、落寞、消沉當中，仍見矛盾的並置和內在的抵抗。

這「內在的抵抗」可說是日佔時期香港文學的特徵之一，其表現有時見諸作品中的曲筆和典故，其中最常見也最有代表性的是有關屈原的典故，例如李志文〈三月簡娜馬〉、陳檳兵〈像一朵雲〉和羅玄圃〈端陽節〉等詩，在和平文藝陣營以外，也有葉靈鳳的散文〈鄉愁〉，²²都共同借用了屈原的故事以言志。

李志文〈三月簡娜馬〉寫給另一位和平文藝陣營作者娜馬，詩中首先引用尼采的「你在想望幸福？幸福算什麼，你在想望工作」作勉勵，再以「智慧之泉源斬斷了」指向勉勵的徒勞，在最後一節，屈原的典故才出現：「苦行之人正臨於汨羅江邊；／我等待靈魂之呼唱！」²³從詩中的我對靈魂歌唱的期待來看，屈原典故在這詩中指向內在覺醒的期待。又如陳檳兵〈像一朵雲〉中的第三節：「水流竟似三閭之哭泣／孤帆中有人擊楫而歌」，屈原曾任三閭大夫，「擊楫而歌」出自東晉名將祖逖誓言克復中原的典故，這兩個典故在詩中的運用指向懷鄉和抵抗。再有羅玄圃〈端陽節〉的末句：「歲月默默洗淨騷人的煩哀，／今日端陽節，／沒有什麼——／只看眾人腹中是汨羅江，／糉子紛紛向肚裡投去。」²⁴可解作對大眾的諷刺，也可指向大眾無法付諸行動的抵抗，若從後一說法，真正指向的

²¹ 《南華日報·副刊》，1944年7月9日。

²² 因本論文的重點是和平文藝，對葉靈鳳未及討論，讀者可參張詠梅〈「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談《華僑日報·文藝週刊》(1944.01.30-1945.12.25)葉靈鳳的作品〉，《作家》總第37期，2005年7月，第17-22頁。

²³ 《南華日報·前鋒》，1942年3月16日。

²⁴ 《南華日報·副刊》，1944年6月30日。

還是抵抗和對無法付諸行動的無奈。

四

李志文除了寫詩，也寫評論和散文隨筆，在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發表的幾篇名為〈門外文談〉的隨筆裡，多次對周作人被片岡鐵兵在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上指斥為「反動老作家」而作出回應，總體上他不完全認同周作人對沈啓無的態度，但又同情周作人的遭遇，立場並不一致，但他行文的重點或不在於周作人，而是針對「以外力破壞內」的人，他說：「中國知識份子勾結盟邦知識份子，連一個老頭子周作人也不放過……只是我們內部那些害群之馬，在利慾高於一切之做人方法下，把國家意識掃蕩得一絲不存，然後半借外力以破壞內而已。」²⁵環顧日佔時期的香港報刊，宣傳性的和平文藝、風花雪月式的文字或隱晦的文學作品有不少，但像李志文這樣相對尖銳的批評並不尋常。

差不多同一時期，李志文在〈懷念幾個友人〉一文先認同路易士始終置身事外，再批評寫「和平八股」的人：

對於一個人之了解真不容易。路易士始終望天看雲，寫煙斗和手杖，這種頑固是好的，因為這是屬於徹底精神之一。但想不到有些一邊寫和平八股的人，卻會談起文學來。這種做人的方法真是有點使我恐怖，原因是太過於意識地來做人了。²⁶

李志文先把路易士和後者分別開，認同他頑固，亦即認同他始終未參與和平文藝陣營，這或可作為路易士後來強調自己沒有參與汪氏集團的引證。接著李志文形容和平文藝為「和平八股」，並批評寫「和平八股」的人，又屬另一微妙，李志文本身作為香港《南華日報》和平文藝陣營之一員，其所撰述的和平文藝理論文章，雖不及娜馬和李漢人之多，但四二年一至二月間亦曾連載多篇〈和平文學論〉，況娜馬早在一九四〇年亦寫過〈和平救國文藝是沒有八股的〉一文，如今李志文〈懷念幾個友人〉一文卻在和平文藝陣營內公開否定和平文藝的論調，加上〈門外文談〉對「以外力破壞內」的批評，一方面可見「和平文藝」在日佔後期的內部矛盾，另一方面亦可見日佔後期，文化宣傳的需要大大減退，官方或殖民意識已弱化，再無意著力於文化上的控制。

在周作人事件上，李志文並非香港唯一的回應者，從四四年六月間《南華日報》分多日轉載周作人對片岡鐵兵指摘的反駁，包括〈文壇之分化〉、〈一封信的後文〉來看，²⁷可見《南華日報》的副刊編輯亦有認同周作人之意，由於事件背後頗有反抗日方對中國文壇的干預，李志文的文章及《南華日報》副刊的轉載，亦見抗戰後期的和平文藝陣營內部，在曲筆典故以外，有另一種「內在抵抗」的表現。

²⁵ 《南華日報·副刊》，1944年7月11日。

²⁶ 《南華日報·副刊》，1944年7月8日。

²⁷ 周作人〈文壇之分化〉及〈一封信的後文〉原分別於1944年4月13日及5月2日刊上海《中華日報》，香港《南華日報》在1944年6月21-24日轉載二文。

目前未能探知李志文是筆名或真實姓名，相信他於一九四二年後任職《南華日報》並擔任主筆，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曾與總編輯伍培之一起出席由《新東亞》月刊主辦的「時局座談會」研討會。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南華日報》停刊之日，李志文發表了一首名為〈向文學告別〉的詩：

曾經在文學之王國流連過十年
如今我要告別
永遠告別了

白雲瞧著我
淒風苦雨在我底周圍
宇宙之魂可以作證
我絕不悲惜
一點黯然也沒有
笑著
向文學決絕
向藝術決絕
向人間底正義與同情決絕

一切都是罪惡
耶穌心坎包藏了屠刀
我反對文字與辭句
我否定所謂文化
我有一股野蠻人底勇氣
我要毀滅文學²⁸

這首決絕且具毀滅性力量的詩歌，李志文向文學決絕的語句背後，藏有更巨大的憤怒，因為他訣別的更包括「人間底正義與同情」，主要是他看到人間「一切都是罪惡」，讓他感到憤怒的似乎不在於文學或藝術，而是整個外在世界、社會和政局。在日治時期的末期，李志文等參與「和平文藝」陣營的作家，曾一度孜孜鼓吹的和平文藝理論已陷於崩潰破滅，〈向文學告別〉一詩中的憤怒可能與此有關，但李志文強調當中沒有悲惜，他最後提出的「毀滅」，既是對日治時期「和平文藝」的否定，也是李志文個人的矛盾與內在抵抗。

（本文是「日治時期香港文學研究——「和平文藝」與戴望舒、葉靈鳳等作家」計劃的部份成果，該計劃蒙香港研究資助局撥款資助〔計劃編號：HKIEd840711〕。）

（全文完）（研討會討論稿，請勿引用）

²⁸李志文〈向文學告別〉，《南華日報·副刊》，1945年1月15日。